



国际政治论坛

近现代 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吴云贵 周燮藩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0 1229 4

·国际政治论坛·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吴云贵 著
周燮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吴云贵,周燮藩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国际政治论坛)

ISBN 7-80149-161-0

I. 近… II. ①吴… ②周… III. ①伊斯兰教-研究-世界-近代②伊斯兰教-研究-世界-现代 IV. B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353 号

·国际政治论坛·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著 者: 吴云贵 周燮藩

责任编辑: 可 心 雁 声

责任校对: 同 文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39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ISBN 7-80149-161-0/D·017

定价: 27.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国际政治论坛》出版者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两极对峙格局下形成的冷战思维和国际政治基础，终于经不起经济全球化强劲潮流的冲击，节节败下阵来，被多极化的现实所取代。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但世界仍然并不太平。国际政治形势呈现出对抗与对话、冲突与合作、动乱与稳定、争霸与反霸、复活冷战思维与彻底摒弃冷战思维，维护旧秩序和创建新秩序的不同势力和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以及经济与安全的双重动荡。迈向新世纪的国际形势的这种两重性：一方面同当前国际关系的“非零和性”和转折时期的过渡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由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深层矛盾所决定的。首先，是大国争夺主导权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全球层面上表现为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在地区层面上则表现为若干地区性强国谋求对地区事务垄断和支配权的野心与多数国家维护地区力量平衡与稳定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冷战旧秩序瓦解后激活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这种矛盾作为殖民主义遗留的严重后果。表现为国际性的泛民族主义和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两种倾向。再次，是围绕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产生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经济全球化扩散到全世界，将其内在矛盾变成为全球性的发展矛盾，从而加剧了南北冲突；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各国谋求自身强大发展的矛盾，引发和加深了各国之间围绕经济利益的竞争和冲突。国际政治的这种两

重性及其所含的矛盾将延伸至下一个世纪。

在今天这个地球村里，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和影响愈益直接地关系到每个村民，人们对国际政局的变化及其信息和获取也表现出空前的热切关注。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兄弟系列，《国际政治论坛》将就人们关心的前沿或热点问题，或是回顾历史，揭示现代国际政治发展的规律，或是分析现实，探讨当前的格局和势态，或是展望未来，预测演变的趋势和前景，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兼收并蓄，精选国内外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优秀学术论著奉献给广大读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序

70年代以来，伊朗革命的胜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勃然兴起，把看似远离现实的宗教推向政治舞台，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兴起后，进而改变了人们对宗教的传统看法，向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到理论、现实、历史三大层面，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宗教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估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带有广泛群众性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如何认识作为许多国家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关系？如果说现代化必须体现民族特色、符合本国国情，那么伊斯兰国家是否真地像原教旨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必须走一条既非东方、亦非西方，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估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史、穆斯林各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史？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应当怎样全面地认识和评估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关系：是原教旨主义力量的崛起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因而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关注”和“反应”，还是西方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到伊斯兰国家的安全因而引起原教旨主义的抗议？诸如此类的许多重大问题，引起世界各国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普遍的关注，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由此而成为一个重大的前沿性课题。80年代以来，我

国学者已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因问题过于复杂，加之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书即是为了更加全面地、系统地梳理这些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尝试。鉴于本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而我国读者一般大多不甚熟悉宗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我想就本书的基本框架和作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把现实问题提升到历史的高度予以观察和思考，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采取的一种方法。本书在评述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时也采用了这一方法，意在把今天和昨天发生的事情与前天的情况联系起来思考。对“前史”的追溯，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向伊斯兰教初创后直至近现代以前的整个历史，即中世纪伊斯兰教史，希望从中找到现实与历史的关联。本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导言”，正是为此目的而设置的。短短一章的篇幅当然不可能详述历史，而只是为了通过评说历史来理清思路、深化认识，并为以后各章的内容提供一个历史根据。在寻找历史线索过程中，三大基本问题引起我们特殊的兴趣，或许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前因”。

首先，穆斯林社团的历史发展进程与伊斯兰教的关系。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顺应了阿拉伯社会由分散的部落向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过渡的历史进程，麦地那穆斯林神权政体（乌玛）的建立标志着这场以创教为开端的社会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着伊斯兰事业的不断发展，穆斯林社团逐渐形成一套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包括认主独一、尊经崇圣、

遵纪守法以及宗教理想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民族观、国家观等等。由于穆斯林社团兴衰荣辱的历史总是与伊斯兰教的处境相联系，而一旦早年穆斯林的社会经验史被认定为不证自明的真主启示的投射和外化的结果，这种宗教信念就会取得永恒的形式。因此，麦地那时期留给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莫过于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理念上树立起一块完美的样板，以后每当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困难和危机，人们就会通过回归传统来寻求答案。这可以说是原教旨主义思想产生最早的宗教历史根源。

其次，伊斯兰教与社会政治学说的关系。麦地那穆斯林社团兴起后，在不断对外扩张中改变了伊斯兰教的形态，使之迅速从民族宗教转化为世界宗教，同时国家与社会发展进程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前，政治体制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即正统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斯兰帝国时期和苏丹制时期。除正统哈里发时期外，其政治体制都是伊斯兰教名义下的封建君主制。这一政教合一体制尽管在不同时期互有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中世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政教分离的政权。究其原因，还得回到初始阶段的正统哈里发时期来寻求答案。麦地那穆斯林社团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政教合一、族教不分的社会共同体，而以真主名义陆续发布的《古兰经》启示，不仅是穆斯林个体持身律己的行为依据，也是指导、制约社会行为、国家行为的一部神圣法典，由此而产生的政教合一体制成为不可更易的“定制”。后来兴起的封建帝国虽有贬低教权、扩大王权的趋势，但由于历代宗教学者们所阐释的伊斯兰政治学说，即逊尼派的哈里发学说和什叶派的伊玛目学说，在法理和道义上仍充分肯定了真主启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地位，国家君主哈里发也不敢公开抗拒真主的意志。封建君主在君权神授的名义下增强了政治合法性，但在法理和道义上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

威。这种历史惯性决定了伊斯兰教往往成为传统力量反对世俗化的旗帜和工具，而恢复伊斯兰教法、鼓吹社会重新伊斯兰化，这些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正是历史上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在当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第三，伊斯兰教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伊斯兰教包括宗教信仰体系、宗教文化传统和由信教群众组成的宗教社会群体三大层面，这三大层面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皆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概而言之，伊斯兰教主要是通过制度性的宗教文化对穆斯林个体和群体，进而对社会发生影响的。对穆斯林个体，它所强调的不是宗教神学思想上的“纯而又纯”，而是对宗教礼仪制度和宗教伦理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身体力行，其中最重要的观念是通过伊斯兰教法体现的“劝善戒恶”，做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穆斯林。对穆斯林群体，它所强调的是穆斯林社团的团结互助意识以及对真主、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历史上由于穆斯林的军队不断对外扩张，传统的对“不信道者”和异教徒举行“圣战”的思想对穆斯林社团影响至深，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区别、穆斯林军队控制的“伊斯兰国土”与异教徒控制下的“敌占国土”的区别，一度在群体关系和政治理念上对穆斯林社团有广泛的影响。尽管伊斯兰教在形态上有制度化的伊斯兰教与被称之为“教中之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在教派上有逊尼、什叶等不同教派的分别，在宗教学法和教义思想上有不同学派的区别，此外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团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也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穆斯林社团，它们彼此之间不仅有共同或相似的宗教情感，对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有许多相近之处。这种因共同的宗教历史文化而对现实的社会问题采取相似态度的现象，是各种世界性宗教所共有的，应当作为我们观察与思考当代宗教现象的一个参照系统。

二

中世纪可以说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方式，曾经对世界穆斯林多民族的知与行，对其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广泛的影响。穆斯林军队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建立的三大帝国（伍麦叶、阿拔斯、奥斯曼）曾经是中世纪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把广阔的伊斯兰世界连成一片，并不断以其扩张对基督教的欧洲构成巨大威胁。新月与十字的战争虽有十字军的多次东征而出现起伏波折，但欧洲的“反击”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它在东西方冲突中的劣势。

然而，约自 18 世纪起，东西方冲突的格局开始出现逆转。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以后变得愈益强大起来，并在资本输出过程中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用火与血写下了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1798 年，拿破仑为与英国争夺东方市场、打开通向印度洋的航道，悍然出兵侵占了当时在名义上仍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这一事件被认定为伊斯兰教近代史的开端。从此，已然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每况愈下，它的大部分地区相继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保护领地，丧失了政治独立和民族尊严。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伊斯兰教在失去强有力的政治庇护的情况下，开始受到外来殖民文化的冲击，陷入深重的危机。这种屈辱的历史遭遇，当代的穆斯林史学家们称之为伊斯兰教的“黑暗时期”。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对世界穆斯林的认知方式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当民族的生存受到巨大威胁时，他们往往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回顾过去、反思现实、展望未来，希冀从自身文化传统中寻求出路。所以从 18 世纪下半叶起，特别是在 19 世

纪，在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等地，陆续兴起种种以复兴伊斯兰教、振奋民族精神，反对殖民统治为主旨的宗教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我们通称为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它们的兴起代表和体现了民族主义兴起前伊斯兰国家和民族对内忧外患所作的宗教回应。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因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不同，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和时代差别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企图通过宗教的复兴来达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这种“宗教兴则民族兴”的观念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宗教思维方式的历史影响，可以说是穆斯林各民族所共有的一种历史意识和文化心态。从总体趋势看，各种思潮和运动不外乎两大类。一种可称为传统主义，即在提倡复兴的同时，更为珍重和留恋传统伊斯兰文化的价值，企图在复归传统中求生存、图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倾向，其价值取向是内在的和历史的，对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一律采取排拒的态度。另一种可称为现代主义，其特点是在呼唤复兴与改革的同时，尤为重视时代精神，强调宗教的形态、趋向和功能应当与社会环境、社会发展潮流相趋同、相适应，其价值取向是现实的和较为开放的，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融合和利用的功利主义态度。

自然，从各种思潮和运动的特殊性观察，也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区分。例如，有的提倡以传统的“圣战”来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如18世纪发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19世纪发生于印度西北部的圣战者运动、印尼苏门答腊的巴德利运动和西非尼日利亚的圣战者运动；有的热衷于修改带有地方民间宗教色彩的苏菲主义传统，以协调与制度化的、“正统”伊斯兰教的关系，如北非的赛努西运动；有的以历史上盛行于民间的马赫迪（期待的救世主）信仰来动员、组织民众，以达到某种社会、

政治或宗教的目的，如苏丹的马赫迪运动、伊朗的巴布运动和印度的艾赫默迪耶运动；有的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联系纽带，企图把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团结在伊斯兰的旗帜下，以制止欧洲列强的扩张势头，如阿富汗尼领导的泛伊斯兰运动；也有的以发展科学、教育，弘扬理性、改革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为主旨，以达到穆斯林民族的复兴，如兴起于印度、埃及等地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如此等等。从规模和影响上看，这些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思潮和运动，以泛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更为重要，它们代表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倾向，彼此间也有交互影响。从思潮和运动的性质上看，有的侧重于宗教道德或宗教思想文化，有的侧重于政治斗争、民族独立或社会整合，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宗教运动。

温故而知新。回顾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可以使我们获得历史意识，从而也就能更深刻地把握现实。人们不是可以从当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许多倾向和特点中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影子”吗？尽管历史和现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三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 20 世纪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在经历过空前的浩劫以后变得更加富有理智和爱心，更加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与和平的可贵。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而论，本世纪以四大事件对其影响更为深刻。一是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这两个互为因果的政治事件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受到一次重创，其反弹的余波至今犹在。土耳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无力在危急关头挽救国家与

民族的危亡，只有代表民族根本利益的民族主义才能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从此，支持还是反对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赞同还是反对政教分离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区分进步和保守的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的伊斯兰教现代派一般都支持土耳其人民自己的选择，而各国的传统派仍留恋泛伊斯兰的哈里发制度，对土耳其革命颇有微词。

第二件大事是在世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推动和影响下兴起于亚、非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及其政党、组织蓬勃兴起，成为亚、非许多伊斯兰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与此同时，各国由宗教领袖组织和领导的伊斯兰教力量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一般都不起主导作用。他们因价值取向不同和利益冲突，在反对殖民统治过程中与民族主义力量若即若离，既有过短暂的联合，也有过冲突和摩擦。二战以后，亚、非一系列伊斯兰国家赢得独立，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领袖人物成为新国家的执政者、领导者，而在斗争中扮演次要角色的伊斯兰教力量无一执掌国家政权。战后国内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伊斯兰国家国内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与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争论和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

第三件大事是战后不久形成的美苏两极机制和以冷战为特征的世界格局，而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因而也更加重要。不言而喻，中东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东西方争夺的焦点，谁控制了中东谁就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美苏两强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矛盾，战后几十年间中东长期动荡不安，四次阿以战争、长达 15

年的黎巴嫩教派冲突和内战、长达 8 年的两伊战争和阿富汗人民反对苏军入侵的战争，使这一地区成为冷战的战场。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阿以冲突中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威信扫地，而为建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统一阵线而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客观上亦有“易帜”和贬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它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特别是它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以“圣战”来解放被占领土耶路撒冷的姿态，使人联想起当年阿富汗尼鼓吹泛伊斯兰团结的呼唤。它也是伊斯兰教再度介入国际政治的一个信号，其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兴起，并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突破口，迅速扩展到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原教旨主义提出的诸多问题中以三个问题更为重要。第一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原教旨主义者以反对世俗化为口号，以社会和政治伊斯兰化为手段，鼓吹宗教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企图以渐进或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我们不赞成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的主张。政教分离主要是指国家政权与教会组织分离，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弘扬理性、增强人类主体性的必然结果。尽管历史上伊斯兰国家有过政教合一的传统，但近代以来事实上的政教分离已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治制度的主流，强行改变不得人心。第二是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原教旨主义者主张以泛化的“伊斯兰主义”来代替民族主义，以宗教信仰认同来代替民族认同，并把世俗的民族主义政权视为“非法政权”，这是对土耳其革命以来所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拒绝和否定。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早已作出结论：泛伊斯兰的政治共同体因缺乏共同的利益驱动必然要遭到失败，而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共同的地域疆界和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共同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心理为基础的现代民族认同是合理的。即使在革命胜利后的

伊朗，它所实行的仍然是一种有限的民族认同而远非无限的泛伊斯兰的宗教认同。第三是宗教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原教旨主义者从宗教文化传统角度来反思伊斯兰国家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某些失误，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们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则是片面的，甚至是谬误的。他们把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政治腐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传统宗教价值失落等等，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世俗化、西方化的结果，似乎只要恢复伊斯兰法治、重新实行伊斯兰化就可以避免这些弊端。他们以封闭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只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而全面拒绝西方的精神文化，这种惟伊斯兰文化独尊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利于伊斯兰国家自身的发展，也有悖于伊斯兰文化的宽容精神。原教旨主义所津津乐道的“伊斯兰发展道路”，缺乏具体的建设性的内容，眼下还只能说是一种“投石问路”。

战后所发生的第四件大事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而出现的冷战格局的结束。它对伊斯兰世界意味着什么，一时还看得不很清楚。从已经出现的趋势看，以三个问题较为突出。一是由于两极制衡机制的消失，过去因两极格局而被掩盖着的许多矛盾突然爆发，宗教狂热与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引发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急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和西方盟国，加大了防范和打击原教旨主义的力度。典型的观点是“伊斯兰威胁论”，即把伊斯兰教等同于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进而等同于不得人心的恐怖主义。这种简单化的不加区分的舆论导向，极大地伤害了世界各国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恶化了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关系。二是海湾战争以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某些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为了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开始推行以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化进程”。国内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执政党政府缺乏民主作风和工作中的

失误，通过议会选举掀起倒阁风波，造成严重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后来由军警出面来恢复秩序、稳定政局，又引起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并把许多一度取得合法地位的宗教政党和组织赶到对立面，走上暴力对抗的道路。三是穆斯林“极端组织”策划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加剧。这些暴力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被它们视为“大撒旦”的美国和西方，针对中东某些亲美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政权，有时甚至也对本国的平民百姓和外国游客“报复”以败坏政府的形象。由于暗杀、爆炸、劫持客机、绑架人质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而主流的世界政治话语是只谴责暴力恐怖主义而不问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不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暴力，这样又使不明真相的普通公众把暴力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产生许多误解，似乎伊斯兰教本质上是崇尚暴力的！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是个大题目，做好了很不容易。尽管作者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肯定还会有许多盲点，还会留下一些遗憾，缺陷和失误只能待再版时予以补救。

吴云贵

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于北京劲松寓所